

知识分子奥登

文|本刊特约撰稿 叶美

今年是诗人威斯斯坦·休·奥登(1907—1973年)诞辰110周年。奥登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因而,在国内,关于他的纪念活动一直在进行着。

他曾在战时到访中国

诗人奥登曾有一篇写哈代的文中谈及自己的时候写到:“16岁之前我没读过一首诗,我成长于一个偏重科学知识的家庭,文学氛围不浓厚,我是由铅矿、窄轨电车和水车组成的梦幻乡村里唯一的异类。”奥登所说的这个地方是位于英格兰中北部临海的约克郡,这个地方也孕育了其他几位英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而他文中所说的偏重于科学知识的家庭,是指他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父亲是一名医生。在这篇文章中,奥登说自己16岁之前从没读过一首诗,直到1922年3月,才决定成为一名诗人,当时他的阅读谱系是德拉·梅尔,W·H·戴维斯,阿尔弗莱德·爱德华·霍斯曼等人,都不是他想要寻找的。直到1923年他读到了哈代,有一年之久,他谁都不读。然后在1924年秋天奥登的精神王国里发生了宫廷政变,哈代不再是他的唯一导师,他的阅读单里加入了爱德华·托马斯,这种情况持续到1926年,那一年奥登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他自言,这时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一场牛津战役,他迷上了艾略特,哈代和托马斯这两位诗人双双被后者打败。

上了牛津后的奥登,很快和戴·刘易斯、斯彭德、麦克尼克斯成为英国新诗的新生力量,他们一同被人们称为以他为首的“奥登派”或“奥登一代”,这期间,奥登也发表了《诗集》,这部集子里的作品篇幅很短小,都没有标题,内容大多涉及隐私,是情感上故意对浪漫主义的反思之作。奥登这个时候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走出牛津大学校园不久就以左翼诗人的身份出场,给英国诗歌界带来了一种耳目一新的写作,1936年他出版了代表作诗集《看吧,陌生人》,里面的诗歌形式严谨,意象浓密,之后他出版了极富音乐韵律的《在岛上》(1937)《另一次》(1940)。

当西班牙内战爆发,奥登当时正与同为牛津才子的路易斯·麦克尼克斯结伴去冰岛寻根旅行,在他们合作写下了《冰岛书简》之后,奥登奔赴伊比利亚。在西班牙的时候,虽然奥登并未亲自参战,但却写下了最优秀的战争诗《西班牙》,用以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从西班牙回来的第二年,即1938年,奥登便与伦敦预科学校时代的挚友衣修伍德一同前往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布香港、广东、汉口、上海、黄河流域战区等,先后访问过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冯玉祥等重要历史人物,留下众多珍贵的一手资料,他们著有《战地行纪》,这本书是一部集诗歌、散文、照片于一体的战地札记,其中奥登创作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更被誉为“奥登三十年代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可以说是这十年间最伟大的英语诗之一。”

他离开英国引同胞责难

1939年对奥登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和衣修伍德一同去了美国,可这



奥登(左一)与衣修伍德中国之旅临行前合影

样一来受到了包括他的仰慕者在内的许多同胞的指责,因为他是以写战争诗歌,谴责法西斯而一直受人们爱戴的,却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英国。他的好友斯彭德也对此颇有微词,他曾说“事既如此,现代艺术里就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躲开看来如此反人性的,客观的世界而遁入个人的,私己的,晦涩的,怪癖的,及不关轻重的世界;另一种是设法将想象生活与现代人类所创造的广大而反人性的组织取得联系……这两种逃避与扩展的趋势时常平行地存在一个诗人的身上。在某些诗人中,扩展的阶段往往为逃避的阶段所接替。”

斯彭德的意思是在分析这两种趋势的时候,他把艾略特作为“逃避”的典型,而把早期奥登作为“扩展”的典型,可是很明显,后期的奥登背叛了斯彭德所描述的这个形象,他本人从来没有为自己做公开辩护。然而在一篇文章里,奥登写到:我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小说家,报道的事情与我无关。如果我被遣返回英国,我所能预见的生活状况与我目前的美国生活没有丝毫差别,无非是阅读,写作和授课。

如果我确信自己足以担当士兵或者防空队员的工作,那么我明天就回去,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在军事上会有什么贡献。是因为我足够理智,或者仅仅是一种胆怯?我不可能给出答案。我唯一确信的就是,一旦英国政府需要我效力,我将在所不辞(我已经告知这里的大使馆了)。但是对于作家和教师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属于知识分子的战场并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任何人都无法断言这个地方或者那段时间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出现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美国最适合我,当然这也只有今后的所作所为能够给予证明。

事实证明,奥登确是按照自己文中的所述,把自己作为并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知识分子,从1956年到1961年奥登在牛津大学担任诗歌教授,1954年,他加入了美国诗人协会,1972年奥登离开美国回到了牛津,住在教会为他提供的小屋里。1973年9月29日,在维也纳的一次诗歌朗诵会后,奥登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回

奥登及其中国之旅

文|严洁琼

细数20世纪英国文坛诗人,奥登绝对是那个中翘楚,他被誉为继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影响遍及英美诗界。他一生曾在五个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长期定居,有过29次两个月以上的旅行,其中26次持续时间超过五个月。如此频繁的旅行经历塑造了他充满矛盾的性格,也深刻地改变了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1938年的中国之旅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一次,和他结伴而来的是他终生的挚友—英国作家衣修伍德,两人之前已经共同创作了三部诗剧《皮下之狗》(1935)、《攀登F6》(1936)和《在边界上》(1938),为了接下来的第四本书,他们来到了中国。

这本书就是后来于1939年出版的《战地行》,一本集诗歌、散文、照片于一体的战地杂记。此书出版时正逢欧战爆发前夕,一度颇为畅销,其中奥登创作的27首十四行诗更被誉为“奥登30年代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可以说是这十年间最伟大的英语诗”。

1937年夏,伦敦菲伯出版社和纽约蓝登书屋联合委托奥登与衣修伍德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书,地点任选。同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到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在日军熊熊燃烧的侵略炮火中,瞬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虽然奥登与衣修伍德一点中文也不会,对远东战局也不甚了解,却在这片战火蔓延的国度中看到了蕴藏的希望。

1938年2月至6月,奥登在中国驻足四月有余,穿越多座城市,而汉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站。中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失守,国民党当局西迁汉口,一时间,这个城市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色人物济济一堂。

离开汉口之后,奥登与衣修伍德一路向南奔赴,途经九江、南昌、金华、温州,最后在5月25日乘着一辆乔装成意大利油轮的船只,来到了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上海。

当时的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只有租界还保持着行政独立,宛若沙漠中的一弯绿洲,因此亦被称为“孤岛时期”。随着大批市民相继涌入租界,租界文化呈现一片畸态繁荣,即使整个城市其余部分都已陷落于炮火包围之中,这里却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法国大餐、美国电影、俱乐部、夜总会、鸦片、妓女……应有尽有。这种强烈对比给奥登与衣修伍德以很大触动。

奥登的《在战时》组诗,虽是写于中日战争期间,却没有一般战地诗歌的粗糙,语言优美,意象深远,很少指向具体事件或者人物,而是用艺术的语言描绘人类在战争面前的苦难、无奈、迷茫。这种诗意地再现战争的方式通过译介传入中国后,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蔚为成风。比如从西南联大崛起的“九叶”派诗人,在诗歌语言、写作技巧上,都可以看到对奥登风格的借鉴。

然而,就在中国诗坛刮起奥登风的同时,奥登自己却变了,在西班牙和中国战场的经历使他认识了战争的残酷和政治的丑恶。旅居美国后,奥登开始反省自己从前的人生信仰,一度在他身上进发的左翼倾向至此戛然而止。中国诗人对奥登的转变毫不知情,对中国诗坛而言,他出现在1938年春天的中国战场,留下了值得反复品味的《在战时》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回

小说家

■ 奥登

装在各自的才能里象穿了制服,
每一位诗人的级别总一目了然;
他们可以像风暴叫我们沐浴,
或者是早天,或者是独居多少年。

他们可以像轻骑兵冲前去:可是他
必须挣脱少年气盛的才分
而学会朴实和笨拙,学会做大家
都以为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

因为要达到他的最低的愿望,
他就得变成了绝顶的厌烦,得遭受
俗气的病痛,像爱情;得在公道场
公道,在龌龊堆里也龌龊个够;
而在他自己脆弱的一身中,他必须
尽可能隐受人类所有的委屈。



朱维基译《在战时》封面